

# 生态文明是生态文学最大的时代召唤

——汪树东生态文学访谈录

□ 李景平

**汪树东**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态文学研究。著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然精神研究》《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天人合一与当代生态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研究》等学术专著，以及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百万余字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史》（四卷本）。

**李景平** 《中国环境报》高级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著有《绿歌》《走过时光》《风在心间行走》《云下山河》等生态散文集。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新闻奖、山西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

◇ 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具有三个层次的重要意义。第一，生态文学促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和扩展了创作题材。第二，生态文学呼唤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第三，生态文学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乃至世界观，即节制欲望、尊重自然、与万物共生。

◇ 相对而言，欧美生态作家具有更为典型的个人性，而中国生态作家越来越表现出鲜明的集体性。因为中国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与美丽中国建设有关，与国家意志有关。

◇ 生态文学的确会对一个时代的生态意识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态文学毕竟是文学，指望文学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往往是不现实的。生态文学更大的作用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是打破人们的“自然冷漠症”，促使人们恢复对大自然的兴趣和想象。只要人们能够充分接受生态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人们的生态意识得以觉醒，就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守护大自然。

◇ 生态文学反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人的内在价值，而是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都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主体，自然万物也是主体，因此人与自然万物要建立一种主体间性，要建立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生态文学是讲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居间的文学，是互联的文学，是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文学。

◇ 万物平等是生态文学的一种理想，也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但是对于不少人而言，接受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难的，这就像那些自我中心主义者要摆脱小我一样艰难。理想的艰难在于此，理想的崇高亦在于此。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乌托邦应该被牢记，其释放出来的光芒也会照射进现实。

##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概念界定

李景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环境文学、生态文学、自然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体现。但人们实际使用这些概念讨论作品的时候，往往把不同作品归在同一概念下，不同概念又往往指涉同一作品。请谈谈您对这些概念的理解。

汪树东：环境文学可以视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最初的发展形态。我国最早倡导环境文学的是高桦。1984年《中国环境报》创刊，高桦从北京文联调入该报社，创办《绿地》文学副刊，打出了环境文学的旗号。当时德国、日本等国家有“公害文学”，主要以文学的形式揭露水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泛滥乃至核污染等环境公害问题。高桦认为在中国称“环境文学”更合适，主题不只是揭露批判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行为，还包括讴歌蓬勃发展的环保事业和为之奉献的环保卫士。现在看来，环境文学的命名体现了环境保护的理念，还存在较为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特点，人与自然的主客两分思维仍是主导形态。

与环境文学相关的是绿色文学的说法。黄文华在《呼唤“绿色文学”》（《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需要绿色

文学来唤起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后来，童庆炳也倡导绿色文学，写了《漫议绿色文学》（《森林与人类》1999年第3期）一文。其实，无论是环境文学还是绿色文学，都是对环境问题的积极应对，但都没有意识到之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

自然文学（自然写作）这一概念源自美国，最早由美国学者费朗西斯·H·哈尔西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自然文学作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ature Writers*）中提出，主要是指美国文学中描写自然、荒野的散文作品。程虹研究美国自然文学的学术专著《寻归荒野》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反响。我国台湾文学界和学术界也倾向于用自然文学（自然写作）这一概念来概括那些描绘观鸟观花、书写荒野体验的写实类型的散文作品。近年来《草原》杂志也在大力倡导自然文学。我认为自然文学（自然写作）这个概念对写作对象的限制过于狭窄，在思想和题材上的涵盖面又太宽，且缺乏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时代文化语境和对生态意识的深层思考。

至于大自然文学，是安徽作家刘先平等学者倡导的。我认为，大自然文学只是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中的一个品类。

生态文学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72年。美国学者约瑟夫·米

克（Joseph W. 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 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学”的概念。其实，此时西方的生态文学已经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据我了解，在我国“生态文学”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许贤绪的论文《当代苏联生态文学》（《中国俄语教学》1987年第1期）中。它是从俄语翻译过来的，作者指出这是当代苏联文学中的一个新名词，但所谈的却是一个老问题，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王诺后来在学术论著《欧美生态文学》中对生态文学的概念给出了界定：“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并从事和表现独特的生态审美的文学。生态责任、文化批判、生态理想、生态预警和生态审美是其突出特点。”这个定义相当完备，尤其是他对生态整体主义的阐释，为生态文学寻找到理想的价值论基石。胡志红、刘晓飞、高旭国等学者也曾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做过反思和补充。

应该说，生态文学这个词无疑最具有现实性、前瞻性、理论性、启发性，其他几个名称都无法开启新的文学空间、开创新的文化

使命。正如李敬泽在《人与自然、人民与生态——在〈十月〉生态文学论坛和〈诗刊〉自然诗歌论坛的发言》（《十月》2022年第1期）中所说，生态这个概念带着新的问题意识，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既可以是批判性的，又可以是建构性的；更重要的是它所暗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是主体的位置和构成问题。生态文学开创了新的广大空间，重新想象人类自身，关系到文学的未来。

我认为，生态文学的崛起已经对传统文学观构成了缓慢但坚定的挑战，我们必须好好地领悟这种挑战所暗含的启示，才能更好地从事文学事业。我认为，生态文学其实要构筑的是一种人类世的大文学观。

**李景平：**对于生态文学、生态文化、生态文明这些概念，你是怎样理解的？它们之间又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汪树东：**我认为要准确理解生态文明，就必须从宏阔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来看。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游牧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史的来路。原始文明延续了几十万年，农业文明延续了近万年，游牧文明延续了大约五六千年，而工业文明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才延续了两百多年，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问题。

鉴于此，生态文明应运而生。

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学都是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大框架下才有意义和价值。2025年5月，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牢牢把握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系统开展生态文化研究，建设完善生态文化载体，丰富生态文化产品和服务，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全面推进生态文化融入生产生活，为新时代新征程以美丽中国建设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其中对生态文化的定位特别关注生态价值观念的指引，也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可以说，生态文化就是促进生态价值观念落地的文化，引导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

而生态文学无疑是生态文化中最具艺术性的一个构成要素。2023年5月，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创作方向包括传播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生态

环境保护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可以说，生态文学要以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为指导，全方位反思现代人的生产生活，反思生态危机的社会文化根源。

可以说，生态文明、生态文化、生态文学是不同层级的概念，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的一部分，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

**李景平：**从我们所谈的多重关系中，可以感受到生态文学在生态文化、生态文明中的重要地位。那么，生态文学对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汪树东：**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生态文学的重要助力。生态文学能够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大自然，重新叙述人与自然之间的故事，重新反思人类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重新在大自然的宏大背景中来理解人的生命的位置和终极意义。因此，生态文学其实是为生态文明建设铸魂的核心力量。梭罗的一部《瓦尔登湖》影响了美国人酷爱荒野的国民性，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惊醒了全人类的科技崇拜迷梦。徐刚等一批作家的生态报告文学和生态散文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生态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和发展具有三个层次的重要意义。

第一，生态文学促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关注大自然，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和扩展了创作题材。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具有较强的世俗性、人文性，往往关注人性、人道、人的社会与历史，很少把人的生活与历史放在宏大的自然背景中审视。生态文学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把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纳入笔端，关注人与自然千变万化的关联，开拓出宏大的文学表现领域。陈应松、张炜、迟子建、阿来、徐刚、胡冬林、傅菲等生态作家在此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第二，生态文学呼唤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对于日益受困于都市的作家而言，生态文学试图呼唤他们或者在都市中寻觅大自然的踪迹，或者冲出都市到大自然中去寻觅灵感，或者去荒野中触摸更纯净的生存经验。生态文学作家的写作是融合田野考察、博物学与生态学知识的文学写作，强调心灵与自然的交流。第三，生态文学赋予中国当代文学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乃至世界观。生态文学所倡导的生态价值观是节制欲望、尊重自然、与万物共生。因此，真正的生态文学必然是洋溢着终极的生命智慧的。

###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梳理

李景平：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国外的“公害文学”引起思考而提出了“环境文学”概念。进入 21 世纪，中国生态文明兴起，“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概念应运而生。请谈谈世界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性作家的作品对中国作家的影响。

汪树东：从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文学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应该说，欧美浪漫主义文学构成了对现代化的第一波强烈批判。受卢梭“返回自然”的思想影响，英国的华兹华斯等湖畔派诗人，以及美国的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相当推崇自然，创作了较早的生态文学。但是若从更具体的历史事件看，1962 年出版的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全球日益凸显的生态危机及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渐趋高潮的欧美环保运动才是当代生态文学诞生的标志。以美国为例，加里·斯奈德、玛丽·奥利弗、W.S. 默温等的生态诗歌，近年来安妮·普鲁的《树民》、芭芭拉·金索沃的《毒木圣经》、理查德·鲍尔斯的《树语》等生态小说，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若以近二十余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为例，其中有不少作家非常关注生态问题，由他们创作的生态文学作品影响很大。例如，南非作家库切非常关注动物权利问题；克莱齐奥对那些远离文明中心的土著人的生态智慧

很感兴趣；托卡尔丘克具有较强的生物学知识背景，是素食主义者和环保积极分子；韩江对植物非常感兴趣。应该说，全球的作家都越来越关注生态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倡导生态意识。

欧美生态文学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生态文学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梭罗的《瓦尔登湖》。我国不少作家都读过《瓦尔登湖》，对梭罗推崇有加，不少作品在出版时都被出版方有意无意地以“中国版的《瓦尔登湖》”这样的广告语来加以推广，如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阎连科的《711 号园》、丁燕的《沙孜湖》、胡冬林的《山林笔记》、傅菲的《深山已晚》等。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对我国批判型生态报告文学影响巨大，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马军的《中国水危机》等。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对四季物候的精细观察和倡导的大地伦理也对中国生态作家产生了较大影响，苇岸、胡冬林、徐刚、李青松等作家深受其影响。约翰·巴勒斯对鸟类的细致观察和精美描绘对龙仁青、傅菲、肖辉跃、王雪茜等作家影响较大。至于加里·斯奈德、玛丽·奥利弗、希尼、耶麦等生态诗人，则对华海、

徐俊国、侯良学等人的生态诗歌产生了较大影响。刘醒龙、张炜、迟子建、红柯等人的生态小说受到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等作品的影响较大。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对中国生态小说中写狼的作品影响较大，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杜光辉的《可可西里狼》等。吉尔伯特·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法利·莫厄特的《屠海》《与狼共度》《鹿之民》、普里什文的散文等生态文学经典对中国生态文学也产生过影响。

**李景平：**您认为中国生态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有哪些？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汪树东：**自1978年以来，中国生态文学已经走过了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最初仅有极少数作家具有生态意识，偶尔创作出具有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后来越来越多的作家直面现实中的生态危机，主动揭露、探讨生态现状和危机根源，传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理念；如今，更多作家加入了生态文学的创作队伍，自觉亲近自然、守护自然，以笔为旗，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可以说，

生态文学已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支极富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生力军。这一发展历程经历了三个较为清晰的历史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的发生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阶段和21世纪头20年的繁荣阶段。

20世纪80年代，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是生态报告文学，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等堪称典型。20世纪90年代，生态长篇小说开始相继出现，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哲夫的《天猎》《地猎》《人猎》等“黑色生态环境系列”长篇小说一度成为畅销小说。张炜的《九月寓言》提出返回野地的生态理想，反抗现代化的姿态鲜明，诗意浓郁。莫言的《食草家族》《酒国》等长篇小说批判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倡导返璞归真。姜滇的《摄生草》、朱启渝的《梦断源头》、湛容的《梦中的河》、亦秋的《涨潮时分》、克非的《无言的圣莽山》等长篇小说反映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诗歌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更为自觉的发展阶段。李瑛、韩作荣、李松涛、李琦、宗鄂、吉狄马加、沈苇、保伍拉且等诗人都创作了富有个人特色的生态诗歌。更具社会影响力的生态诗歌作品频繁出现，如于坚的《哀滇池》、李松涛的《拒

绝末日》、韩作荣的《寻找一棵大树》等。

21世纪头20年，生态文学进入了繁荣阶段。首先，更多作家加入了生态创作队伍，而且大都已经具有了自觉的生态意识，尤为重要的是，许多作家都是当今文坛中非常著名的重要作家，如阿来、迟子建、贾平凹、陈应松、张炜、邱华栋、雷平阳、李少君、吉狄马加、韩少功、刘亮程、雪漠等。其次，生态文学已经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如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等作品就获得了极大的市场成功。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李存葆的《大河遗梦》、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刘亮程的《在新疆》、周晓枫的《巨鲸歌唱》、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鲍尔吉·原野的《流水似的的走马》、徐刚的《大森林》等获得鲁迅文学奖。再次，不少作家已经形成了生态文学创作的典型现象，如陈应松关于神农架的生态叙事，阿来关于川西藏族聚居区的生态叙事，雷平阳关于云南的生态抒情，胡冬林关于长白山的生态描绘，傅菲关于赣东北的生态书写，李娟关于阿勒泰地区的生态叙事，沈念关于

湖南洞庭湖的生态书写等。

从生态文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生态文学创作队伍，会有更多作家响应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家协会关于繁荣生态文学的号召。同时，也会有更多作家专注于特定地域的生态书写，如高维生、刘德远对长白山生态的倾情书写，田万里对新疆阿克苏的生态书写等。

**李景平：**与西方相比较，中国生态文学作家群体有什么样的特点？中国生态文学与世界生态文学作品相比，其优缺点是什么？

**汪树东：**相对而言，欧美生态作家具有更为典型的个人性，而中国生态作家越来越表现出鲜明的集体性。比如对于理查德·梅比这样的英国自然写作者而言，回归自然，与杂草共处，考究树木的智慧，体验原野的灵性，都只关乎个人的生命抉择，因此他在《杂草的故事》《树的故事》《心向原野：自然如何治愈了我》等作品中坦然呈现的是高度个性化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是个人灵性的蓦然绽放。对于中国生态作家而言，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与美丽中国建设有关，与国家意志有关。因此，中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往往体现出较为鲜明的集体性。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往往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具有生态守护的强烈使命感，具有浓郁的悲剧感和悲剧精神，多种生态立场并存，多元生态景观共存，强调生态和人文的平衡，凸显万物和谐、天人合一的理想追寻。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也存在一些欠缺之处。第一，不少作家的作品缺乏自觉的生态整体观，思想深度不够。第二，缺乏足够的科学精神和知识储备，对生态危机的复杂性理解不深。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坚守。第四，艺术上不够成熟，模式化、同质化较严重。第五，经典作品还不够多。

**李景平：**正如你所说，生态文学具有警醒现实、开启未来的作用。那么，新时代中国生态文学的作用该如何体现？

**汪树东：**生态文学的确会对一个时代的生态意识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态文学毕竟是文学，指望文学对社会现实产生直接的作用往往是不现实的。生态文学更大的作用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是打破人们的“自然冷漠症”，促使人们恢复对大自然的兴趣和想象。只要人们能够充分接受生态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只要人

们的生态意识得以觉醒，就会去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守护大自然。

## 生态文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如何突破

**李景平：**我们讨论生态文学，往往涉及主义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传统文学强调人学，环境文学认为传统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生态文学认为环境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自然文学认为生态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你认为生态文学中“人”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

**汪树东：**生态文学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颠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指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和颠覆。也就是说，生态文学不认为只有人才是目的，才具有内在价值；它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相信大自然对于人类而言不只具有工具价值。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实则是人类不成熟的表现。就像一个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认为只有自己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人都得围绕着他转一样，对于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我们说他是不成熟的，是精神不觉醒的。人类中心主义亦复如是。

生态文学反对价值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是否定人的内在价值，而是认识到人与自然万物都一样具有内在价值，人是主体，自然万物也是主体，因此人与自然万物要建立一种主体间性，要建立和谐共处的生命共同体。人在生态文学中不能像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文学那样占据高高在上的位置，但也不是完全销声匿迹的。生态文学中，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相处、相生相克，共同维护着生态系统整体的繁荣与平衡。如果自然文学倡导者认为生态文学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只能放逐人，只能关注自然，那就走向另一个极端了。生态文学是讲述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是居间的文学，是互联的文学，是强调生命共同体的文学。

**李景平：**在生态文学中，我们的作家常说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与万物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否只是一种生态文学的理想？是否是生态乌托邦？你如何看待所谓的万物平等？

**汪树东：**从客观真实的自然存在来看，自然生态是残酷的吗？其实不是的，残酷的观念是我们人类社会集体认知对大自然的投射。在大自然中，草从土壤中汲

取养分，兔子吃草，狼吃野兔，狼死后又化身为泥土，构成环环相扣的生态链。在这样的生态链中，没有什么是残酷的，狼吃野兔并不残酷，熊吃鲑鱼也并不残酷，一切都是生命能量的循环，无所谓残酷与否。真正的残酷是，当人类凭借理性力量和语言力量、科技和群体团结从大自然中脱离出来后，不愿意再受生态系统的平衡法则制约，从而发展出永无餍足的欲望和尽可能满足欲望的科技力量，并对自然万物敲骨吸髓。因此，残酷其实是人性的一种伴生物。大自然是没有残酷一说的。

万物平等是生态文学的一种理想，也是生态文学的核心诉求。但是对于不少人而言，接受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理念还是非常困难的，这就像那些自我中心主义者要摆脱小我一样艰难。理想的艰难在于此，理想的崇高亦在于此。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生态乌托邦应该被牢记，其释放出来的光芒也会照射进现实。

**李景平：**当前的生态文学创作多聚焦于草原、森林、山野等荒僻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对城市、乡村、工业等现实生态环境保护缺乏关注。你认为出现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突破？

**汪树东：**生态文学作家总以为荒野蕴藏着最后的救赎，人性最纯净之处恰是人迹罕至之处。生态文学出现这种荒野崇拜，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人心中可能都蕴藏着一个伊甸园、桃花源的理想。人类最初来自大自然，慢慢地远离了大自然，于是会不由自主地把大自然理想化、神化、美化。更兼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浪潮无远弗届，人因之获益，也深受其困。于是人们日益想念大自然的自由自在、无私无欲，渴望回归自然。因此，大量生态文学作品描写草原、森林、山野、大漠等，试图填补人们因自然缺失症造成的心理空缺。应该说，这也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不过，生态文学还是不能简单地停留于此。生态文学同时必须关注城市、乡村甚至工业场所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对其中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展开富有诗意、富有深度的想象与描绘。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引导人们返回荒野，过原始人的生活，而是在充分吸收工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重建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这无疑是对生态文学作家的时代召唤。**■**